

我所认识的陈逸飞



陈逸飞、魏景山于1976年创作的《蒋家王朝的覆灭》第二稿

“要整体，要块面，要把握主次关系”，这是已故画家陈逸飞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我认识陈逸飞是在1973年，那时我经隔壁弄堂的长笛演奏家徐仁爱女士介绍，拜上海京剧院邵隆海先生为师学习油画。邵隆海196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油画系，与陈逸飞同在油画雕塑创作室工作。

我第一次听到陈逸飞的名字是因为油画《金训华》。这幅画的署名是油画雕塑创作室集体创作，我便问邵隆海，是不是你画的，他回答说不是，是陈逸飞画的。于是我请邵隆海带我去见陈逸飞，他同意了，并说只有他能随时进陈逸飞的画室，因为他与陈逸飞合用一间工作室。后来我才知道，当初领导邵洛羊先生为分配画室一事征求大家意见时，其他人早就自由组合配好了，只剩下陈逸飞和邵隆海没有落实。陈逸飞扭头看着邵隆海，叹了一口气，手

轻轻搭在邵隆海的肩膀上说：“隆海，咱们一间吧。”

没多久，邵隆海借调到京剧院，工作室就归陈逸飞一个人独用了，包括邵隆海每月十五元的颜料费也都归陈逸飞了。我看着堆积如山的颜料和画布，真想伸手拿一支大管白色颜料，但邵隆海像看透了我的心思，提醒我说，别说少一支，就是挤过一点，陈逸飞也看得出来。后来我亲眼看到有的画家为了挤一点颜料而闹不愉快的事。现在我自己的颜料也堆积如山了，可最不适应的还是别的画家过来借颜料，似乎挤走的不是颜料，而是我创作的灵感。后来我听陈川（电影演员陈冲的哥哥）说，陈逸飞为人很虔诚，许多学生得到过他无偿提供的颜料和画布，他还帮助陈丹青从江西农村调到江苏落户，只收了一袋花生米；他还帮助某人弄到一把进口小提琴云云。

油画雕塑创作室就在今天长乐路新

锦江的位置，当年是一个废弃的哥特式礼拜堂。开始时油画组和雕塑组都挤在大堂里，中间用布隔开。后来油画组嫌雕塑组灰尘多，太零乱，另外在南面建了五间小的工作室，每间约20平米，每间两个人，但创作大幅的作品还是要挤到礼拜堂里去。

那天邵隆海带我去时，陈逸飞正在礼拜堂里创作巨幅双联画《黄河颂》和《红旗颂》。而他和邵隆海合用的画室成了他的仓库和卧室，里面有个全副武装的人模道具，手里拿着冲锋枪，笔挺地站在墙角，边上堆着破旧的军衣和钢盔，桌子上还有其他的“武器弹药”，军队用的小号，旧的皮鞋等等，像是到了消防队里。邵隆海告诉我这些都是陈逸飞用来创作的道具，是从“好八连”借来的。门背后那张帆布床，是陈逸飞晚上睡觉用的。邵隆海让我把习作摊在帆布床上，等陈逸飞进来时请他看一看。

不一会，进来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戴副眼镜，很斯文，邵隆海说他就是陈逸飞，然后把我介绍给他。这时候他注意到了帆布床上我的习作，说：“你画的？蛮好！要整体，要块面，要把握主次关系。”

从此以后，不管邵隆海是否在油雕室，我都以找他为由去敲陈逸飞的门，有几次敲门进去都看见一位年轻女人，脸庞秀丽，举止端庄，在给陈逸飞摆姿势。后来邵隆海告诉我，她叫张芷，1967年毕业于上海美校，是陈逸飞的校友、模特，也是他太太。张芷后来跟陈逸飞一同赴美，育有一子，现在一人定居纽约……

1976年，陈逸飞与魏景山联手创作北京军事博物馆“解放南京”大订件，当时“解放南京”共画了两幅，第一幅画完以后陈逸飞觉得不满意，与魏景山商量再画一幅，于是拍了一张照片留下，画布就刮掉了。后来由邵隆海在京剧院将照片冲出来，多印了一张送给我，我如获至宝，保存至今。

“解放南京”大订件，作品完成后正式题名为《蒋家王朝的覆灭》。当时为创作这幅油画，陈逸飞和魏景山多次去南京收集素材，有许多细节我是亲眼看见的。比如，当时冲上南京总统府的是华野部队，这支部队是原国民党三十五军吴化文的起义部队。起义部队与老解放区的部队有个明显的区别，就是鞋子不同。老区部队穿的是村嫂做的布鞋，而起义部队穿的是高帮皮鞋。陈逸飞打算全部改用布鞋或草鞋。魏景山认为皮鞋更有表现力，也更符合历史。他还特地借来了一双很旧的翻毛高帮皮鞋，放在桌子上。后来画面上共出现五只“半”鞋子，三只是布鞋，两只只是草鞋，“半只”（另半只隐在暗处）是皮鞋。又比如，当时从好八连陈列馆只借来了一套正宗的华野军服，那套军服的袖口处破损严重，不得不卷起袖子穿，但画面上共出现二十位不同姿势的军人，都是穿着这一套军服做的造型，都卷着袖子。陈逸飞觉得不行，于是凭想象画了一个不卷袖的。画了半天，退

后看看，他自言自语说，像只假手。实际上，陈逸飞习惯画撩起袖管的人物，从《金训华》到《开路先锋》，甚至后面他的自画像《踱步》，都卷起袖管。又比如，为了显现1949年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百孔千疮、弹痕累累的效果，陈逸飞找来一块破水泥板，藉以寻找石头的质感，他共画了四十几块缺陷不同的石头，从一个侧面，表现了解放战争的惨烈。后来作品获得好评，破损的花岗岩富有质感，起了很大的作用。又比如，当时选好的是凌空俯视的角度，大面积的南京城区背景很零乱，画起来既不讨好又吃功夫。陈逸飞想出浓烟滚滚的办法，遮挡了大部分的天空和背景，使人看了可信又讨巧。关键是使得画面更加整体，而且分出了主次关系。这幅画一直挂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二楼。多年后我去军博看望它，画前围着一大群北大的女学生和老师，无意中听到了她们的议论。她们议论的话题很多，其中一个话题我听明白了，像上海这样的不出阳刚男人的地方，怎会产生这么威武的作品？她们不知道我就是上海男人，但我感觉自己脸在发烫，低下头夺路而逃。

1979年是我进入上海美校的第二年，陈逸飞应孟光（美校的素描老师）邀请回母校上示范课。那天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有个摄制组也来全程跟踪拍摄，架起了大灯和反光板，我认出了摄制组的编导就是淮一小学美术老师丘美丽的丈夫杨先生。但我并没有因为认得摄制组的人而被孟光老师网开一面，学校规定，上午陈逸飞起稿时，一律不准进入拍摄现场。我们被允许在下午三点以后，各班排好队轮流进入现场观摩。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正在食堂窗口排队，看到陈逸飞和摄制组的人一道进来。

排在我后面的是陆佩蒂老师（原先教过陈逸飞俄语，后来教我们英语），陈逸飞排在她的后面。陆问陈：“赴美的手续办得如何？”陈答：“一切都好了，就等签证。”陆又问：“你的英语基础差怎么办？”陈答：“去了再说，总不见得放下创作不搞，专攻英语吧！”陆问：“基本的日常用语要备一点吧？”陈答：“陈冲（影星，当时在外上读一年级）介绍了一个老师，每周见一次，主要教一些日常口语……”

那天的午饭是三口并两口吃的，同学们都急不可耐地冲向宁波路二楼拍摄现场，我也不例外。那是一幅女人半身肖像，并非先前盛传的女裸体。画面很淡，线条优美而流畅，基本功非常之扎实。后来片子出来，我们连看好几遍，把所有的用笔过程背得滚瓜烂熟。孟光老师从头至尾在边上指导，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要整体，要块面，要把握主次关系。”于是，那段时间同学们见面打招呼就说：“要整体，要块面。”

其实就人生之道而言，又何尝不是需要“整体，块面”？当人们拘泥于琐碎的细部时，被某些不顺心的事而烦恼时，就要提醒自己要“整体”，要忽略细节，不要被细节牵着鼻子走。另外，生活又是如同一条起伏的曲线，最忌失去棱角而流于油滑，要抓得住，要有体积和重量，不能像飘带一样随风飞舞。这就是孟光老师的素描哲学和人生之道。以至于陈逸飞也常把恩师的教导挂在嘴边：“要整体，要块面，要把握主次关系。”

他的《蒋家王朝的覆灭》就是忠实地贯彻这一绘画哲学的典范。中国人民的四年解放战争，就战争的意义而言，是一个政治集团推翻了另一个政治集团的黑暗统治，而组成这支军队的主体是农民。在历史的焦点时刻，陈逸飞没有选择领袖人物的更替，而是画了三十几个农民。无论他们身上穿着什么或手里拿着什么，或许他们几天几夜都没有洗



陈逸飞、魏景山于1976年创作的《蒋家王朝的覆灭》第三稿

脸刷牙，他们本质上是一群农民。恰恰是他们，创造了惊天动地的历史。所以《蒋家王朝的覆灭》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伟大作品，永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紧接着他又创作了《踱步》。宽银幕构图，画面的左侧是一把老旧的黑色靠背木椅，画面的右侧是他自己低着头沉思的背影，中间是层层迭迭的历史画卷。其中似乎有鸦片战争、甲午风云、八国联军、南京大屠杀……

陈逸飞是油雕室最早一批入党的青年之一。1980年兴起了一股出国热，油雕室也相继有人出国，党员的组织关系也变得尴尬起来。邵隆海虽说是党小组长，但对新形势下的党员去留问题也并非了如指掌。他曾经对我叹气说：“上面来调查陈逸飞去美国的情况，我一无所知。”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俨然不把我当学生看，也不把我看作是一个党外人士。后来陈逸飞入了美国籍，面对着星条旗举起了他的右手，这只手曾经在画有镰刀和榔头的红旗前面也举过，现在想来，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体积和重量”感稍差一些。

陈逸飞到美国十五年，画了五个主题系列的作品。第一是意大利威尼斯风景系列；第二是洋人肖像系列；第三是中国江南水乡风景系列；第四是中国美女系列；第五是西藏风情系列。纵观五大系列，百多幅油画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96年，陈逸飞回上海后，投资拍摄了电影《人约黄昏》，后又一发不可收地投资其它产业，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2004年，他与上海市委副书记殷一璀一路侃侃而谈沿着泰康路田子坊的弄堂进来。2005年，却在一天清晨的电波中，听到他积劳成疾，丙肝暴发、门脉高压造成大出血，倒在电影《理发师》拍摄现场的噩耗，终年59岁。回想我过去见到他的种种情景，不禁唏嘘！（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孙海
春秋

三擒自俄大盗

—
1948年10月。一列从北平开往上海的火车。

硬席车厢内，坐着一位外国旅客。他叫乔奇，持有苏联护照。乔奇看上去很年轻，二十五六岁的模样，长着一张具有东欧人典型特征的脸：高鼻子，双眼凹陷，脸瘦削，略黄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他低着头，正在打瞌睡，嘴角上还不时流露出几丝得意的微笑。也许，他正在梦中为自己能成功骗过苏联驻北平办事处的一等秘书雪立琴而洋洋得意。在北平，无生活着落的乔奇曾向苏联驻北平办事处求助过。办事处的一等秘书雪立琴要他写一份情况。乔奇在自述中把自己天花乱坠地吹嘘了一通。说自己二次大战中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过，曾在美军舰艇上当过报务员，该舰艇专门在舟山群岛一带收集美军在海战中的尸骸；他还在张家口和八路军有过联系，为了偷日本人的军事地图，曾杀死过日本人云云。雪立琴相信了他，向乔奇准备去哪里落脚。乔奇说去上海。此时恰遇军事顾问罗斯上校进屋，雪立琴把乔奇介绍给了罗斯上校，让他有困难去找罗斯帮忙，罗斯过几天将去上海工作。

上海，对乔奇来说，是他谋生的诺亚方舟，是他冒险的乐园。1939年，乔奇的母亲把他从哈尔滨带到上海，让他在俄国人办的一所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乔奇为找工作而发愁。他曾在一家牛奶公司干过送奶的活，其余的经历便是以行窃谋生。他在上海因行窃曾坐过四次牢，每次坐牢，那些狱友又教他不行窃技巧。乔奇的窃技变得日趋高超，加上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干过，攀楼翻墙功夫更是不凡。

这次乔奇回上海的另一个理由，是他在江湾机场邮务部工作的兄长为他在上海找了一份不错的差事，让他赶快到上海报到。

—
乔奇到上海后，对他哥哥找的工作并不满意，自己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叫卡夫卡斯的咖啡馆另谋了一份当领班的差事。每天闻着巴西磨咖啡的香雾，听着悠闲的美国乡村音乐，尽管收入不多，但能享受西方的情调。工作之余，乔奇喜欢到爱丽斯酒吧坐坐。在那里，他认识了一位叫谢托洛夫的调音师。

一天，谢托洛夫邀乔奇去他家中玩。乔奇赴约后，谢托洛夫神秘地把